竹乡红镇故事多(下)

刘兴华

三 诸佛庵是军工儿女的第二故乡。在“小三线”建设中，大别山区的诸佛庵区域，自1964年至1966年先后建起皖西机械厂、红星机械厂、皖西化工厂、江北机械厂、皖西医院。据统计，诸佛庵“四厂一院”总占地面积1500亩，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，拥有干部职工5460人，随迁家属子女16400余人，大山深处陡增22000多人口。因此，诸佛庵成为著名的“小上海”和当地“最大的城市”。由于体制改革，“三线厂”经过30年建设，至1994年全部搬迁合肥、蚌埠等地。“三线企业”建设助推了当地经济繁荣，特别是集镇建设，1993年诸佛庵集镇被评为全省百家名镇。“三线人”留下的科技观念、文化观念、开放观念、创业观念是老区人民的无形资产和宝贵精神财富。

1994年三线厂搬迁完毕，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利用原有厂房建设了江北厂工业集中区、狮山农民返乡创业园区、红星厂工业区。至2018年，诸佛庵镇工业位居全县前列，成为霍山乡镇工业的一面旗帜。

诸佛庵镇结合美好乡村和茶谷建设，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，大力实施“旅游兴镇”战略，深度开发仙人冲“三线厂”遗址和八处景观，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画家工作室、名家展示厅、生活体验馆，把仙人冲打造成集画家创作写生、旅游度假、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项目。

初到画家村，映入眼帘的是房屋墙面绘制的各种风格的图画，沿路而上，又是另一番

美景。道路两旁峭壁险峻、怪石嶙峋，峰峦翠色入眼，一条小溪穿村而过。按照“保持原有风貌、全面治理环境、打造特色小镇”的要求建设，“三线厂”摇身一变成画家村，成为名符其实的艺术乐园。中央美院副教授、油画家马俊，油画家、国画家、教授、国家一级美术师杨国新等60多位画家入住，创作了众多优秀作品，获得社会一致好评。

四 诸佛庵绿色竹乡如画如诗，令人神往。解放初，茅山林区在桃源河乡刘家老屋有一块6亩毛竹林，1952年在其中3亩竹园里上盖塘泥作肥料，原来围径1尺左右的竹子长到1.5尺左右，最大一棵围径粗1.75尺，群众叫“竹王”。诸佛庵镇是毛竹之乡，号称竹海。解放初，仅5000亩，蓄积量35万根，土改后增加不多。经过多年发展，2018年全镇毛竹为15万余亩，蓄积量达6000余万根，形成了“万亩竹海”的壮丽景观，有“安徽竹子之乡”和“江北毛竹第一镇”之称。

倾力打造大别山第一竹海旅游区。旅游区已形成一镇、两环、两区，即以诸佛庵集镇为中心，放射式发展；打造以人文资源为主的仙人冲艺术部落旅游环线，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大别山第一竹海自然景观环线；建设仙人冲艺术部落文化区，大别山第一竹海自然保护区。仙人冲艺术部落入口服务区、军工特色区、艺术聚集区、艺术教育区、画家村区、原生态文化体验区、红色体验区已初具规模。大别山第一竹海规划为桃源河水库风景区、桃源河原始森林风景区、茅山原始森林风景区、缆车旅游观光区、高山寨旅游风景区，正在紧锣密鼓地投资建设。

全镇紧紧围绕“一竹三笋”建设，以成立竹农专业合作社和家庭林场为抓手，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，培育“一竹三笋”示范户和示范基地，重点发展毛竹“冬笋、鞭笋、春笋”特色产业，推动全镇毛竹一二三产全面协调发展。全镇每年采伐利用竹材约600万根，竹笋500吨，笋干50吨，全镇竹产业年产值1.5亿元。诸佛庵镇现有竹产业加工企业约50家，是全国竹胶板、竹地板重要的生产基地。

五 诸佛庵是美丽的茶乡。《霍山县志》记载，明清时期诸佛庵集市贸易重点就是茶业。为发展茶业生产，民国13年(1924年)，在诸佛庵东岳庙筹建安徽省霍山茶业改良场，14年(1925年)建成，直到解放。解放后，大力发展茶叶生产，到2018年，全镇茶园14500亩，产茶557000公斤。

建设名茶基地。诸佛庵镇80%的土地是海拔800米以下的山地、低山丘陵，坡度在25度以下的地区大都产

茶，茶树遍布全镇各村。解放前，茶叶生产是小农经营，大多是粮茶间作，老式从播。1958年，兴办诸佛庵乡茶场，1980年，县拿出4万元扶持茶场追肥，使大多数茶场得到巩固，其中诸佛庵茶场、桃源河、建华、茶场办得较好。1981年，县曾在诸佛庵召开全县茶场座谈会，总结推广办好茶场的6条基本经验。2010年建设西石门名优茶苗基地，由霍山茗源茶树良种开发公司建设。同年流转200余亩土地，建立良种园、母穗园。

诸佛庵茶叶品质优良，曾经有“霍山名茶出三金”的说法，即大化坪金鸡山、太阳金竹坪、诸佛庵金家湾。诸佛庵产的茶叶香高味浓，能冲泡三交汤。诸佛庵小茶久负盛名，制造工序和黄山茶异曲同工。《安徽特产资料类编》记述，“前志所载诸名目花色如银针、雀舌，则茶始萌芽者；梅花片、兰花片、松萝春则茶初放叶者，统名之小茶，价既数倍，采之推难，诸佛庵数处有之，远销京都为多。”清朝作为贡茶敬奉皇官。

“小岷春”同样是历史贡茶。小岷春原产地诸佛庵小干洞，皆茶之极品。明朝始入贡，自弘治七年分设霍山县、州县供贡。皖志资料书记载：“小岷春，小岷亦山名也，出茶名岷春”。现在的“小岷春”是诸佛庵农技站高级农艺师李积成于1987年按名茶“色、香、味、形”品质要求，及名、特、优的独特风格，配以精细手工精制而成的。

上谷红茶品质好，工艺好，文化好，是色、香、味三绝的名茶。上谷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类，是以茶树的芽叶为原料，经过萎凋、揉捻、发酵、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精制而成。因其干茶色泽和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，故名红茶。

茶叶是诸佛庵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。六安瓜片茶园基地建在杨泗岭与金寨县毗邻的齐山高山上，具有“晴时早晚遍地雾，阴雨成天满山云”的气候特点。笔者有幸结识一位杨泗岭青色冲的瓜片大户喻发家。据他介绍，他家有茶山20余亩，主要培育瓜片原材料。瓜片采摘旺季请采茶工30余人，聘请师傅多时达到六七人，加工的瓜片色泽翠绿，富有白霜，香气清香持久，叶底黄绿明亮，在瓜片中别具风格。当天来求购瓜片的客商络绎不绝。晚上，笔者等人回到热情款待，一桌地道农家土菜令人回味无穷，香茶、美酒、佳肴，大家畅叙友情，深夜无眠。这就是诸佛庵乡民真诚、淳朴的写照吧。

朱世卿的烽火岁月

胡遵远 张应松

朱世卿，1911年6月7日出生在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930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。1932年冬天，朱世卿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十师三十团一路辗转拼杀，来到了位于川陕边界的通江县。从鄂豫皖苏区入川以来，部队沿途奔波浴血奋战，加之供给严重不足，战士们个个饥寒耐穿不避体。当地老百姓看见这支红军队伍，都觉得很奇怪，看着他们虽像“叫花子”，却又人人扛着一条枪。说是像部队，又个个衣衫褴褛食宿街头。于是感到十分恐慌的老百姓们纷纷把家里吃的喝的，包括盐巴都藏起来，然后跑得远远的，躲得无影无踪。

饥寒交迫下，朱世卿他们彻夜难眠，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割的一样，战士们蜷缩在一起，默默地忍受着。朱世卿的裤腿早已破成了碎片，两只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，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。不得已，他就在地上连蹦带跳地踩着脚取暖。踩着踩着，忽然听见地上发出异样的声音，这激起了他探索的欲望，于是朱世卿拿起挖壕沟的铲子刨了几下，结果发现地下露出一个大坑。仔细一看，坑里堆着一些山芋。这一下，不亚于看见了满屋黄金，战士们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。一名战士拿起一个山芋就啃，“哎呀！有些麻嘴！”其他战士就把山芋拿出来生起篝火烤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浓浓的香味就飘了起来，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的饱饭。第二天早上开拔前，朱世卿和战友们在山芋坑里放了两块银元，并原封不动地填上了土。

朱世卿机智灵活的表现，在革命战争中屡不胜。1949年解放前，四川山里的老百姓最珍贵的是盐巴。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年代里，每看到有部队过来，当地的老百姓都赶紧收起家里的粮食和盐巴，然后躲藏起来。1949年底，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朱世卿所在的部队刚刚到一个山村时，村里的百姓连同土豪早已跑得干干净净。部队把土豪家里的一头肥猪杀了让战士们“美餐”一顿，可是由于没有盐，白花花的肥肉实在难以咽下。于是朱世卿就在村里到处转，一圈回来之后，便忙活起来。大家看着他所在连里的战士大伙快快地吃起来，心中十分纳闷！这时，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王新亭盯着他们走过来，二话不说直接夹起一块肉送到嘴里，发现朱世卿他们吃的肉是有咸味的。王新亭好奇地，朱世卿忙把一碗放了盐的肉递过去，并说出其中的秘密。原来，朱世卿和战士们端着空碗，到老乡家挨家挨户地用水清洗了人家的空盐罐子，这样用洗出来的盐水煮肉就好吃多了。王新亭听了，顺手朝朱世卿的头上拍了一下说道：“还是你小子的脑子灵活，鬼点子多！”(上)

来源：学习强国

父亲很瘦小，身高不到一米六，作为一个在农村干体力活的男人来说，这个身材是没有任何优势的。

父亲在我开始记事时起就是一个光头，我的出生，对于父亲来说，算是老年得子，对我的疼爱程度可想而知，那可是“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怕摔了”，无以复加的溺爱。

我的童年，大多在父亲的肩度过的，那个在大集体的时代，每天繁重的活(修水库、挖塘、砌堰、改田、筑坝)，常常让身强力壮的男劳力都累得浑身无力，更何况和他们做同样活计的、我那瘦小的父亲呢？然而，父亲只要一放工回到家里，就带我玩，虽然那时没有幼儿园，也没有玩具，甚至连填饱肚子的米饭都没有，然而，却是非常快乐的童年。

父亲的肩膀，就是我童年的乐园。父亲经常用双手把我举过头顶，让我岔开双腿，骑在他的脖子上，我的两条小腿夹着父亲的脖子，一双小手抱着他的光头，嘴里还学着电影里骑马时的叫声“驾驾驾”，同时，小屁股在父亲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，模仿骑马的动作，可是，小手却无法演示鞭打马的动作，因为后面是空的，有时只好拍在自己的屁股上，父亲和我都开心地哈哈大笑，此刻的父亲就如同孩子一样，布满皱纹的脸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如盛开的金菊，阳光而沧桑。

我和父亲把这个骑在肩膀上的游戏叫“打马肩儿”。

父亲的肩膀

赵承河

然而，仅仅一个打马肩儿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那好动的顽劣性，就让父亲趴在地上，我骑在他的背上，真正把父亲当马骑，拽着父亲的衣领当缰绳，小手拍着父亲的身体，疯狂地咯咯笑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就阻止我们，数落我父亲，说你腰疼还要跟孩子这样疯。

这个打马肩的举动，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后，才彻底从我的童年生活里退出。

那个时候，县里经常会有放映队轮流在每一个公社的广场集中露天电影，五六岁的我，只要听说有电影，不管父亲白天干活多累，都缠着父亲带我去看电影，而父亲呢，也不管自己有多么累，只要我一叫唤，他就毫不犹豫地背起我走十来里山路去看。

那时候山里还没有公路，都是崎岖狭窄的山路，从我所在的大队到公社，要翻过一座

山，然后顺山沟走羊肠小道，小道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，一边是悬崖，特别险峻。记得那个夜晚特别黑，半阴天，山风呼啸，父亲扛着我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山路上，我听到这尖锐的响声，偶尔还有几声猫头鹰的啸叫，再加树林里飒飒作响的无名声音，让人毛骨悚然，我吓得不敢吱声，紧紧地抱着父亲的光头，缩着身体，趴在父亲的头上，两条小腿吓得在父亲的肩膀上打哆嗦。

父亲见我害怕，就给我讲故事来壮胆，其实，他自己也非常害怕，四周放眼望去，一片漆黑，特别是走到一个叫莲花洼的地方，传说这里特别“涩”(对闹鬼地方的称呼)，突然，树林里发出如同一把扇子从空中落下时的“噼里啪啦”响声，父亲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，壮着胆子大喊一声“谁？！”

然而，树林里一片寂静，什么也没有。我说：“爸，俺们不去了，我怕。”

“好的，不去了。”

父亲背着我转身往回走，刚走不远，前面草丛里突然又是“呼啦”一声响，居然还飘出一团鬼火(磷火)，父亲吓坏了，急急匆匆往回走，谁知鬼火越出问题，父亲的脚步踢到树兜上，摔了一下，把我从肩上摔了出去，我大叫一声，父亲奋不顾身地往前一扑，在我落地前倒在地上当垫子，而我准确地砸在父亲的身上。父亲赶紧抱起我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心，小声地给我喊魂：“小魂儿莫怕哈”连喊了七声，然后站起身来，把我搂在怀里。刚站起身，就见前面移动着一个大黑影子，父亲吓得嗓音都变了，颤抖地喊了一声“谁啊？”

“我啊。你不是俺亲家老表吗？”来人听出了我父亲的声音，父亲也听出了来人的声音，原来是莲花洼附近的一户李姓人家，夜里出来打兔子。

父亲看到熟人，心里胆大了，把刚才的情况一说，我表叔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真胆小，肯定是草丛里的兔子跑出来，踹倒了腐烂的树桩，树桩里有磷，就产生了磷火。走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打过马肩儿了。

父亲的肩膀虽不厚实，却是我成长的坚实基础，在我的感受里，父亲的肩膀充满着对子女的疼爱和呵护。

一年之中，只有冬季是最闲的，仿佛一切都慢了下来。尤其是丰收了的农民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。看着孙子孙女在空调房里玩手机，我突然想起我们儿时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，想起简单快乐的童年。

我们小时候真可谓是“水深火热”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更不用说有自己的玩具了。但顽皮好动是孩子们的天性，我们小时候当然也不例外。我们信手拈来的就是玩具。捡到一片瓦片，在水里，可以玩“漂游”；在空地上，可以玩“买房子”……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东西，都是我们多姿多彩的玩具。

买房子又叫“跳房子”，用瓦片在地上划出两排八个格子，每一个格子排一个“房子”，参加游戏的两三个小朋友轮流把瓦片从第一个格子开始，单腿跳跃把丢入“房子”的瓦片按顺序往外面踢，瓦片和脚都不能压线，并能顺利踢出瓦片的，继续从第二间“房子”、第三间“房子”跳，以此类推，谁按顺序踢完了八间“房子”，谁就可以背对着八间“房子”丢石子，石子落在哪间“房子”里，那间“房子”就归你了，然后从头再来；当经过你已经踢过的那间“房子”时，你可以双脚着地，休息一会儿，因为，那已经是你的“家”了。

冬天我们玩的最多的游戏还有“砸老包”。玩这个游戏，每个人要先有“老包”。“老包”是用写过作业的旧本子纸折成的，也有用旧报纸折成的。纸质好的“老包”更贵重。折好的“老包”分正反两面。先通过“剪刀包子布”分出胜负，输家的“老包”先放在地上，赢家用自己的“老包”砸过去，如此轮流操作。如果“砸”翻了，这个“老包”就归了赢家，赢家再放上一个，而且奖励一次。

“砸老包”也有技巧，有时候还借助自己穿的衣服——那个时候，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，通常都比较大，而且没有纽扣，用力“砸”下去，敞开的袄子也会扇过去一阵风，常常让我用一两个“老包”就能赢小伙伴的很多个。这种既用体力又讲技巧的游戏，把我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，冬天的寒冷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现在的孩子，玩具一大堆，还常常抱着手机不放。他们获得知识的渠道比我们多，更比我们聪明，但缺少了我们童年时候的狂野和激情。我怀念我们的童年，怀念童年时的单纯和快乐。

姑妈

彭红兵

11月25日，金寨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，我从哥哥那里得到姑妈去世的消息，心情仿佛也进入了冬季。在悲伤的情绪里，姑妈的点点滴滴在眼前浮现。

姑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因父亲在政府工作，姑妈没有像大多数老百姓一样流离失所，而且，从小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学习成绩一直优异，后毕业于湖北高等师范学院。在湖北武汉第一中学教授语文期间，姑妈认识了我的姑父，一位来自湖南的体育老师。他们结婚后，我的表姐、两个表哥相继出生。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，那是姑妈最幸福的时光。

期间姑妈的父亲——我的爷爷，从老家金寨县吴店镇西庄村彭湾(现在的竹根河村)带出一批青年人到湖北武汉学习发展，这批青年中就有我的父亲。后来我父亲在爷爷的指引下参军走上革命道路。父亲经常跟我谈起爷爷、姑妈对他在

人生、生活上的指导和关心。姑妈一直秉持了爷爷的家国情怀，一生牵挂家乡。

文革时期成分高的姑父遭到了批斗，为了孩子的未来姑妈带着爷爷和三个孩子回到家乡，在西庄团山小学教书。姑妈同姑父这一别就是十五年，姑妈把对姑父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，扎根农村教育一线为家乡培养人才。爷爷回到家乡也没闲着，在中央倡导除“四害”活动中因发明了除苍蝇笼子还登上《安徽日报》。大表哥因文笔、普通话优异被沙河乡广播站选中。大表哥的成绩离不开姑妈的言传身教，这慰藉了姑妈忧伤的心情。后来，爷爷的身体慢慢不好，姑妈忙于学校工作，还忙于孩子们的教育，却还坚持着看爷爷吃了她做的饭菜后再去学校，就这样一直到爷爷去世。

可能是上天眷顾姑妈，文革结束后姑父在多方打听下联系上了姑

本报记者 王丽 摄